

# 警惕反对浪费出现“破窗效应”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章立制的重要成果。中央要求,对铺张浪费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杜绝“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原是犯罪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是指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比如一间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修

补,隔不久其他窗户也会被人打破。杜绝“破窗效应”,健全法规制度是基础。中央“八项规定”施行以来,“三公”消费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满意度大幅度上升,取得了良好效果。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到会议费管理新规、贺卡节礼“禁令”,我们已编制了细密的制度“防护网”,特别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更是防止铺张浪费、杜绝“破窗效应”的一把“利剑”。

杜绝“破窗效应”,提高执行力是关键。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缺乏应有的执行力,即使再完善的法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也就是说,只要法规制度得到严格落实,人们的节约意识增强了,铺张浪费就没有“第一次”,也没有“下不为例”。提高执行力,重在始终坚持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坚持“用一把尺子量长短”,增强刚性,坚决防止和克服厚此薄彼,紧一阵、松一阵的情况出现。

杜绝“破窗效应”,搞好监督是保障。及时有效的监督是提高法规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正确实施监督,能够时时刻刻让人保持足够的警醒,而不敢有任何邪念,自觉远离浪费行为,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并把这种习惯融入自己的血脉,固化为一种精神、一种作风、一种信念,从根本上铲除“破窗效应”赖以产生的土壤。

申国华

国资委12月6日通报查处了中粮集团所属中粮肉食公司公款以“试吃”为名送礼的违纪行为。国资委通报显示,今年中秋节前,中粮肉食公司将部分新产品送中粮集团有关人员“试吃”,送出礼品113份,合计53788元。(12月7日《新京报》)

## “试吃”难逃舌尖上的腐败

中粮肉食公司以“试吃”为名送礼之实,明显属于公款送节礼的违纪行为。“中粮肉食公司个别领导人员,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央纪律、国资委党委三令五申,顶风违纪,性质严重,影响很坏。”国资委纪委监察局称。

“试吃”通常是超市、零食店等商家惯用的促销手段,为了招揽顾客免费提供小量的食品。然而,就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中粮肉食公司却目无党纪,胸无国法,顶风违纪,以“试吃”之名,行送礼之实,以为玩弄一下文字游戏就可以侥幸逃脱党纪国法的约束,以为自己手段高明能够在国家反腐肃贪的万里长城边上偷偷扒开一个口子。可以说,这次查处的中粮肉食公司公款送礼案,虽然案值并不高,意义却不小。这是中央打“老虎”、也拍“苍蝇”的实际行动,是将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主动出击。通过这次查处,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让那些思想上有所松动,盼着八项规定是“一阵风”、“大呼隆”,早点过去、快点“回归正常”的人及时惊醒,早日悬崖勒马,可谓查得及时,查得必要,查得深得民心。

中粮肉食公司以“试吃”为名,一共送出礼品113份,合计53788元,每份礼品价值约476元,这和那些动辄几千甚至几万的天价餐相比,同那些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贪腐巨案相比,似乎显得不值一提,甚至有人会说这是小题大做。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及时堵住这看似不大的漏洞,不及时刹住这微微邪风,我们的改革事业就可能在这些贪腐中分崩离析,我们党的威信、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消弭于无形。

“试吃”背后,折射的既是我们反腐的成效,也是在提醒我们日后反腐工作难度的提升。今年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查处贪腐力度的加大,中央八项规定愈发深入人心。一些平时“吃习惯了”、“喝舒服了”的人,开始坐不住了,尤其在节日期间,更是贪腐腐败的易发多发期,明的转暗的,暗的转到近乎于无形,于是,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形式更加隐蔽,花样不断翻新。我们要时刻警惕以各种名目用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用国家资源慷一己之慨的做法,像查处“试吃”一样,“老虎”、“苍蝇”一个都不能放过。

宋华

因收入不高,为省房租,靠捡废品为生的全老太居住在北京朝阳区都广场南门外西侧地下管井里多年,被称为“井族”。而另一位洗车工“井族”王秀青,靠住井下节约的钱供3个孩子上学。在“首善之地”北京,“井族”并不孤独,媒体调查中发现有数十人之众。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有关部门已将一些“井族”居住的井口封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遣返回老家。(12月8日《京华时报》)

## 关注“井族”不要一地鸡毛

通过媒体的报道,社会对京城“井族”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人们的激情围观,给他们带来利好的一面,是有好心人捐钱捐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寒冬;而不利的一面是,因为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赖以生存的“家”——下管井被陆续封堵,他们要么被遣返回老家,要么被送往救助站。估计要不了多久,“井族”将随着社会关注的减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城市将回复往昔的安宁。

不管你承认与否,城市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纯粹流浪者生活强一点的务工者。他们中的不少人目的并不是乞讨和流浪,而是通过辛苦劳作来养活自己,甚至还要养活家人。他们不是流浪者,因此把他们一概而论的送到救助站也不太合适。由于舆论的关注,人们被他们的一些事迹所打动,不少人给他们捐钱捐物,但那往往是新闻事件处于热潮时的短暂激情。媒体不可能天天都这样关注他们,这样的帮助估计也持续不了太久,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这种关注热潮之后的稳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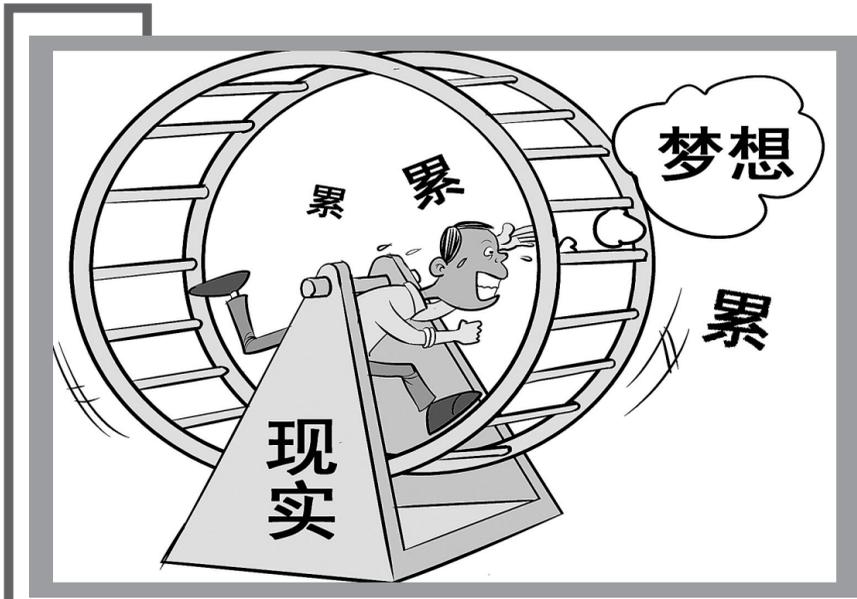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可以不住在井里面,回到农村有低保吃,到城里连个藏身之处都没有,何必呢?这样的逻辑,跟“何不食肉糜”没太大区别。吃不吃得上下低保,他们的孩子要读书,生病要治病,这些事只要是活着总得面对的。靠自己的力气在城市里务工挣钱,又妨碍了别人什么?无非是住在井下,给这个城市抹了黑。

上帝每关上一扇门,就会开启一扇窗。城市的管理者封上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井口,那么就应该给他们开启另一个生存的出口。封住下水井盖很容易,但是让住在里面的人有所归依,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近年来,诸如“井族”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反遭更悲惨的命运的事例已不鲜见。媒体聚集北京“蚁族”,结果“蚁族”聚集的北京唐家岭被拆迁;人们关心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然后他们原本还能读书的学校被拆;这次人们关心这些井底蜗居者,随即这些井口被封堵……社会的关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关注过后,却是一地鸡毛。

关注没有错,也不必简单的指责媒体报道,让人们了解“井族”这个群体,也是媒体的责任。但不能因为社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城市管理者就用“锯箭疗法”,马上把那些“有碍观瞻”的现象,清理出人们的视野。更需要做的是透过这样一个表象,来看到我们社会肌理的病态,通过更为细致的工作,诊疗这个族群存在的病因,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把这种现象一清除,就万事大吉。

华文



2013年,面对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身边一片喊“累”之声: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当然,也有少数人“累并快乐”或者“累并幸福”着。在四川省,参与《小康》“2013个人的年度心情”调查的74个人中,共有6人提到“累”字。而在全国参与这项调查的2013个人中,“累”字被提及的频率更是达到了80多次,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小康》调查发现,不仅北京人、广东人普遍倦怠感,在人们心目中还算是比较休闲的地方——四川以及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甘肃,人们也都喊着“累、累、累”。

此外,在河南、江苏、湖北、陕西、天津、海南等地,“累”都是被受访者提及最多的感受,黑龙江人更是用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老累了。

焦海洋/图

## “起跑线”之累

女儿3岁了。婴儿时,半夜起来给她冲奶粉、换尿布;稍大一点,教她走路、说话,虽然感觉挺不容易,倒也乐在其中,并不觉得多累。前些天,社区通知适龄儿童上幼儿园,兴致勃勃地带着女儿去体检、报名、入园,一圆下来,感觉真累,不为别的,就为3个字:起跑线。

先去儿童医院,一切常规检查结束,没什么问题。医生说,还是有必要做个智商测试。嘿,这么小就能测智商?好,有意思,做!一系列测试下来,医生给出结论:先天智商96,后天教育太少,“你这孩子挺聪明,就是婴幼儿教育不够,以后益智类的教育、游戏要多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啊!”

想想也是,尽管自己小时候压根儿没玩过什么益智玩具,也没参加过幼教套餐,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别人的小孩都搞这些,她不搞,明显就输在起跑线了嘛。好,该买就买,该参加就参加!在医生的推荐下,到儿童用品商店,大肆搜罗了一番。

到了幼儿园,一切入园手续办妥。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你女儿已经比其他小孩入园晚了,你看要不要给她报个兴趣班,尽快适应适应环境?”

心想,毕竟才3岁,自理能力都还没有,学什么特长?见我犹豫,老师有点不大乐意,一是纠正我,是兴趣不是特长;二是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小孩子得学啊,不然以后别的小孩都会,她不会,她就成个例了,这很容易导致孤僻。想想也有道理,虽然不要求她出类拔萃,但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嘛!报!于是,画画班,舞蹈班,都报。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接女儿,老师把我喊住:“你女儿身高还可以,就是体重不达标,得加强营养,不然会影响智力发育。”于是,当天晚上我们一家子就绞尽脑汁给她做了个营养套餐计划。于是,蛋白质、维生素……该补的补,该吃的吃。

一天,女儿刚走进家门,就一下趴在沙发上。我问她,是不是被欺负了?结果她的回答差点没把我雷倒:今天好累噢!3岁娃娃也会喊累?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上山打鸟、下河摸鱼,从来都是精力狂野充沛,也没累的感觉啊。难道时代真的变了?突然想到前不久在电梯里碰到的一幕。那天,我刚进电梯正准备关门,一个约摸10岁的小男

孩匆匆跑进了来,咣当一声,就跌坐在地上。见他半天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我心想,这小子还真会偷懒,倒了也不知道爬起来。当我伸手去帮他捡书包时,才发现,我完全低估了那个书包的重量:起码十好几斤。在小男孩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书包为什么这么重——他一天要参加正课、补课、奥数班、特长班,基本上每堂课都有课本、有作业。

突然感觉很是庆幸,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有背过那么重的书包;至少,我还有过自由散漫的童年,而他们的童年早已被无止境补课所取代,却还理直气壮,都是为他们好。

庆幸过后,担忧出来了:女儿那么瘦弱,说不准哪天的厚书包就背到我肩上了。以前,也常常对应该教育说三道四,也曾痛下决心:将来绝不让自己的小孩成为“牺牲品”。但孩子到了学龄阶段,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不得不把她送去参加无休无止的“起跑线”角逐: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教的、学的……看来,这个“起跑线”还真是不好赢,但也不敢输啊,要是真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这个责任可确实担不起!

一个字:累!

文惠

“先富起来的理应承担帮助弱者的责任,他们负有这样的责任。”7日,以教授哲学公开课“公正”而风靡全球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首次到访广州,他还告诫:“人类迫切需要找到更好的价值观。”(12月8日《南方都市报》)

## 好运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公平公正就像太阳的光辉,理应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有。公平公正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公平公正,就没有正常的秩序,没有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在当下社会,成功学是一些人所爱谈论的话题。成功意味着出人头地,意味着混得好。“成功人士总觉得他们是全靠自己而取得成功”,桑德尔却再次否定了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他说,每个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同时还得有社会团体的帮助以及可能的祖辈恩泽。

在社会学的解释里,社会存在着分层,人生来就面临着不平等,就缺乏公平公正地获得社会所提供的理想事物的机会。确定社会分层的是财富、权力和声望。社会不仅把理想事物给予了那些有才学有能力的人,还把理想事物赋予了那些有好运气的人:有好爹好妈的人,有好出身好根基好背景的人。

钱向来是好东西。钱能带来更多的活法,带来种种幸运的感受。但是,钱并不是幸福本身,一屋子的钱和幸福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桑德尔看来,这样一个原本清晰的价值观已岌岌可危。原来我们把市场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给我们造福,而现在金钱却主导了我们的教育、爱情、法律等方面。他认为,人类迫切需要找到方法,寻求一个金钱之外的、更好的社会价值观。

好的价值观之一,应是社会的公平公正。每个人都有追逐财富的梦想和权力,但是社会要在制度层面给它的社会成员以公平公正的机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这里的道,不应是君子约束自己行为的守德之道,好的制度还应确立约束之“道”,确立公平公正之“道”,使得非君子轻易拿不走不义之财。

桑德尔说,那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人,往往会有个习惯,总忘记自己其实是运气好。可以说,善忘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人再善忘,也不能忘记生命和人的本质。运气,是个靠不住的东西。随着境遇的改变,好运气会变成坏运气。人有好运气,才更应该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帮助弱者,帮助不幸的人,这类利他、利社会的行为,往往也是利己的。更不用说,利他、利社会的行为还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幸运。今语

## 亮出传统文化这张身份证

近日,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的两本书《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释》火了。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考察期间,到中国传统文化标志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他翻阅两本书后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无论如何,研究孔子文化的书籍受到追捧都是一件好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温孔子文化,汲取国学精髓,能让我们对浩瀚的中华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对博大的中华文化有更笃实的自信。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千百年来滋养着一代代国人。过去,我们曾以拥有这种影响世界的文化富矿为荣;过去,我们也曾以否定和破坏这种文化基因而快。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给予这种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更多的关照是多么的必要。

重拾传统文化,是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和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民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物质上的不断丰富,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匮乏获得了同步解决。很多时候,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容易给人们带来一种精神困境:焦虑、困惑、无助等心理健康问题凸显,过去许多是非明晰的道德问题现在变得模棱两可。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人的精神家园。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越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华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入研究,传承弘扬”,用儒家文化“修道德、建人伦”,用高度的文化自觉修养自身,用主流价值“擦拭”道德,走出精神的困境、道德的洼地。

重拾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是我们融入世界并赢得尊重的需要。正如杨叔子先生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化身份证。”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这样一张身份证,它让世界“一眼就认出了中国”。中国的孝悌之意、中庸之道,无不是中国给世人留下的最鲜明印象。

中国是到了该拿出更多诚意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还须不卑不亢地展示和输出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世界看到中国人重礼仪、重道德的文化特质,让世界了解并认同中国所倡导的民族和谐、宗教宽容、师法自然、中庸之道等主张,以打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隔阂,纠正世界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研究孔子的两本书火了。尽管只是细微的文化动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认识水平的提升,国人对传统文化会更加青睐、更加看重,传统文化这张民族身份证会更加闪亮,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会更加可观。

李思辉

## 我们需要怎样的“理性”和“宽容”

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如今这个时代最容易引起围观和争论。近期舆论热议的重庆“女孩电梯摔童”事件,便是典型例证。事件本身仍在发展,媒体舆论也仍在发酵,但有些人的观点却颇为“特别”——他们认为公众应“宽容”肇事女孩,因为她只是一个因“常年遭父母打骂”而性格不好的孩子;他们还认为,受害者的家人不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男童的奶奶当时不应让他一个人留在电梯。

最近几年,几乎在所有涉及道德和法律判断的社会热点事件中,都会有人发出类似的呼吁“宽容”和“反思”的声音。比如,在北京“大兴排童案”中,也曾有人跳出来呼吁受害者的母亲“反思”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吗?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我们打算“宽容”什么,并对什么进行“反思”。

“女孩电梯摔童”事件刚被媒体曝光时,微博和微信上充斥着很多谩骂涉事女孩及其父母的声音,甚至有人情绪激动地

高喊“必须让她坐一辈子牢”。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暴戾氛围的担忧,一些传统媒体的评论员们慌忙发出了呼吁“理性”和“宽容”的声音。只不过,在急于营造一个宽容理性的舆论环境之时,很多人都混淆了主次,忘了首先应对受害者及其家人送去一些起码的同情和慰问。

那些主张“理性”和“宽容”的人,大都认为不应将尚未成年的肇事者作为主要批评对象,而应寻找导致“摔童”事件的社会根源;他们甚至认为,网上一些批评肇事女孩的言论与女孩对撞打男童的行为没有区别。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费解和不安的舆论趋势,即每当发生一些恶性事件时,总会有一些人为彰显自己的“理性”和“宽容”,急于对施暴者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为他们开脱责任。

在从性格、家庭环境等方面为女孩摔童行为寻求合理解释的同时,还有一位评论员竟认为,在这个事件中,男童奶奶的就应要负一半责任——她当时应先

将幼童抱出电梯,而不是先拿童车。在这里,他显然混淆了一起恶意的暴力伤害事件,与一起无意的过失伤害(比如小孩因大人照顾不周而手指被夹)之间的本质区别。

反过来,我很少看到有几篇报道和评论,是站在同情和关爱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立场上的。我看到的很多文章,差不多都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性”——我们应“宽容”小女孩的恶行,应展开“反思”的则主要是受害者。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固然不可取,但这种“宽容”和“反思”,难道就是我们期待的“理性”吗?

当然,对一些论者的“理性”感到费解,并不意味着赞成咒骂女孩的恶毒言语。我素来相信,法律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好和唯一手段。但我必须要说,我时刻准备对发表上述“理性”言论的知识分子,发出最严厉的谴责——你们的“理性”和“宽容”让人寒心,你们的自以为是为令你们连最基本的非都分不清。

我其实觉得,当这些自以为为学过一点法律和科学的知识分子,将网络上那些谴责暴力恶行的有些偏激的言论批为“道德绑架”,宣称我们“没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展开舆论审判时,他们自己真正站在“智商制高点”对整个社会展开自命不凡的智力审判。因为对“愚昧闭塞”的道德传统和世道人心的嘲讽和瓦解,能够反衬出他们自己是多么“理性”、多么“宽容”、睿智和进步。

作为一个同样主张理性和宽容的知识分子,我所受到的传统道德教诲,给了我这样的观念:需要得到宽容的,是一个犯了错乃至犯了罪的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他们所犯下的那种错误和罪行本身。否则,我们就是在纵容甚至鼓励他们以及更多人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和罪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我们真正没有资格做的事情,不是发出我们的道德义愤,而是代替受害者去“原谅”和“宽恕”施暴者。

陈季冰